

我讀日本書法家

任钦功著

西泠印社出版社



任钦功 字骏臣，法号慈庆、吉钦。1970年生于山东省莱西市，1996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艺术文化系。2006年获日本神户大学硕士学位。2016年暹罗大学国际学院艺术教育博士在读。

2004—2006年，任教于日本国际文化教育交流协会。2008年，担任美术杂志《中外画刊》主编。2004年至今担任《中国书画报》《书法报》专栏作者。

专著有《我读日本书法家》《中国粉笔字书写艺术》《任钦功书法》《一玩拾墨》。主编有《新中国美术家大典》《图说中国当代美术》。

现任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贸易报·艺术周刊》主编，《佛教文化周刊》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成教学院“佛教文化与书法创作”工作室导师，全国少先队辅导员暨少年儿童书画大展组委会主任、评审委员会秘书长，“王羲之奖”全国书法大展组委会副主任、监委会主任，山东青年美术大展组委会副主任、监委会主任。

走进那部既熟悉又陌生的书法史

◆ 任钦功

《我读日本书法家》一书缘于2003年《中国书画报》资深编辑秦立申先生向我约稿，为将于2004年元月创办的“海外版”设一个有关日本书法方面的专栏。我当时正留学于日本神户大学，研究方向正是中日书法比较研究，对我来说这个约稿正是一次很难得的历练和学习的机会。以此为动力，我开始了书法史，特别是日本书法史的全面梳理，以期找到下笔的切入点。书法史是在不断的传承、发展中得以构筑完善的，而这个传承的工作则是由一位位具有创新精神的书法家来完成，书法史即是通过一幅幅书法经典作品来展现的。换言之，一部书法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书法家的传承史，把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书法家如同珍珠般地串起来，便是一部完整的书法发展史。鉴于此，我从大量的日本史料中开始筛选，经过反复对比权衡，从日本真正文明之初的大和时代开始到20世纪初叶的大正时代结束，共甄选了39位书法家。在书法家的选择上并没有完全遵从日本书法史一贯的定位，而是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进行审视，从书法“母国”的角度进行对比研究，从而选定了这39位书法家。依时间为序，把他们穿起来，通过对这些代表性书法家的艺术进行个体性解读，从而达到了解一个完整的日本书法发展脉络的目的，尽量还原一个日本书法的“原

始”面貌给所有关注日本书法的人们。

日本书法的发展无疑同中国书法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它是随着中国书法的发展而发展的。在神户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中，我把日本书法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不自觉传播发展时期；二，自觉传播发展时期。我个人认为，从日本书法的缘起到20世纪止，日本的书法发展历史可谓是一部日本佛教书法发展的历史。它随着日本佛教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日本佛教的广泛传播而形成了书法上的门派林立。日本佛教的发展对书法的变革发挥着极其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日本的大和时代之初，也就是中国的隋代，佛教开始传入日本，由此开始了日本新文明的发展。正是佛教的传来，掀开了日本书法发展史的第一页，这也正是我在上面所提到的日本书法的“不自觉传播发展时期”。所谓的不自觉发展，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日本书法是作为佛教的载体不自觉地从中国传来，而非为书法而书法，为艺术而书法，是为佛教而书法。这一时期日本书法唯一的“佛教性”，决定了书法形式的单一性，即仅仅局限于“写经体”的传播，推动书法发展的同时也限制了书法的全面性，这从圣德太子、光明皇后等流传下来的写经可以得到印证。这一现象延续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也是最重要的，当时的佛教是日本的国教，一切以佛教为标准，人们的思想是不二的，所以书法的形式是不二的。其二，也是最基础的，佛教是通过当时的遣隋使僧团传来日本的，所以经卷便成为了他们在当时的不二选择，同时奠定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书法基础。

日本书法的发展同中国书法的发展相比较，虽然都是从实用性开始，但这个实用的层面又是不同的。中国的书法是直接建立在文字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而日本书法则是作为为佛教服务的工具而开始了它的发展历程。中国书法的发

展是以文字发展为脉络，以文字的演变而逐渐盛开，在发展之初便具有了朴素的艺术欣赏性，如发现的甲骨文；而日本书法则是简单地从中国“拿来”，没有文字学核心文化的沉淀和书法学上的演变过程。包括日本大和时代之后的历史时期，日本书法的发展注入了很强烈的“拿来主义”，这个“拿来主义”推动着日本书法的发展。重要的是它能把“拿来”的书法同日本的本土文化进行融汇，形成自己新的文化内涵，以中国书法为基础形成自己的艺术表现形式，并且构建了同中国不同的“多重化”书法体系，出现了汉字书法、假名书法、和风书法等的共同发展。这从日本平安时代开始表现得尤为突出，平安时代也开启了日本书法自觉传播发展时期的序幕。

对于日本书法往往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我们一直以来在用“书法母国”的心态看待日本书法，这种思想的差异主要是文化背景的不同使然。如前所述，日本书法不同于中国书法是由文字的发生发展为前提，是“拿来”，所以便产生了根本的区别，但这种区别并不能影响日本书法的历史价值，反而我们应该肯定它的历史贡献，它使得中国书法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我们以辩证的关系去分析，除却传统基础不论，在另一文化土壤的孕育下，它首先推动了禅宗书法的发展，然后丰富了假名书法的表现内涵，这是在佛教传入日本之前的中国书法所没有的。当然，如果论及战后日本“现代书法”的发展则有着更为不同的历史意义，最起码日本“现代书法”的概念是对中国当代书法有着借鉴意义的，这在20世纪的“八五思潮”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新的书法概念的提出应该从纯粹的文化观去研究，正如佛教传来中国，经过中华文化的整合发展又对印度当代佛教的发展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平安时代开始，日本进入了文明的快速发展时期，遣唐使的使命不再以学习佛文化为唯一的目的，而是对整个大唐文明进行全面学习，因此平安时代的

文化呈现了本土化、多样化的发展，书法上由简单的“拿来”开始了立体性的文化整合。由于延续历史上学问僧的派遣这一官方惯例，书法的佛教性一直贯穿了日本整个平安时代，因此造就了许多的僧侣书法大家。僧侣书法家成为了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主流，如最澄、空海、圆仁、圆珍，以至平安时代后期的西念等等。但平安时代中期开始，随着小野道风“和样书”的完成，以及假名书法的成熟，日本书法走向了立体的多样发展。在整个平安时代对于书法无论是哪一种艺术表现体式都呈现了“儒雅”“润泽”“秀美”的审美取向，这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文化立场”。平安时代有着数个世纪的漫长史，是日本政治、文化、艺术全面发展的时期，经济高度发展，最后则崩溃于贵族阶级过度奢华的物质和精神追求。

1192年随着贵族统治阶级被镰仓武家政权取代，京都的贵族文化开始衰退，表现在书法上则是“和样书”“假名书”“唐风书”开始走向了衰微。日本政权一直推崇的佛教文化开始了对曹洞宗、临济宗的追随，书法也转向了对宋、元书风的承传，这种书法精神的转变走向了同武家政治的相合，改变了唐风书法的一贯影响，呈现了宽博、敦厚、浪漫的艺术精神，同平安时代的书风上有了根本的区别。从书法风格上来看，有了更为细化的延续，和样书法有了更为丰富的展现，出现了以藤原中通为代表的法性寺流、以后京极良经为代表的后京极流、以后深草天皇和后宇多天皇等为代表的宸翰样、以皇子尊圆法亲王为代表的青莲院流等。佛教书法仍是镰仓时代书风的主流，涌现了寂莲、荣西、道元、兰溪道隆、日莲、一山一宁、宗峰妙超等一大批禅宗书法家，推动了日本书法的全面发展。形成这一全面而丰富的书法发展的态势来自于和样书风同假名书法的巧妙结合，来自于宋元书法的传承影响。

本人在日本教授中国书法时，最为感动的是日本学书者，甚或那些有所影

响的书道家们极为认真的学习态度，在示范的过程中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有的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拍摄以回去反复揣摩研究。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书法是从中国“拿来”，却能在中国书法的传统基础上不断融汇自己的本土文化并形成独特艺术精神的根本所在。这种精神随着历史的发展越发深厚，在忍耐了漫长的历史寂寞后最终达到了“突变”，而反过来对中国书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的“八五思潮”可谓代表。当然并不是说这种“突变”只是来自于爆发期的历史时期，而是对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是不可或缺的。14世纪初期的南北朝战争再一次使日本文化得到了升华的机会，和样书法和假名书法衰微到了历史的极限，取而代之的是“五山样”的流行。由于南北朝战争，人们生活苦不堪言，向往“世外生活”，而此时由于“五山文化”的影响，禅林发展盛行，给了人们以避世之所，造就了诸如大灯国师、寂室元光、绝海中津、一休宗纯等禅林大家，他们也是当时的书法大家。这些禅林大师的推动使日本书法开始了新的发展，日本书法开始了“禅性”的历史发展，“禅宗书法”成为了日本南北朝、室町时代书法的主流。

“五山文化”的发展使得日本文化真正地走向了平民，得到了真正的文化普及。书法也不例外地得到了它的眷顾，这一普及的等待历经千年，正是这“耐得住的寂寞”的积淀，到江户时代，日本书法开始了真正的“百花齐放”。这种文化现象是显像于整个日本文化的，如源于奈良时代的赏樱习俗，一直到日本整个的平安时代赏樱都仅仅是作为宫廷贵族娱乐而流行的。同书法的发展一样，到江户时代商人阶级兴起后赏樱才在庶民中流行开来，所以文化的开明是同政治、经济的高度发展密不可分的。在这个经济相对发达的时代，书法上呈现了多样化的发展，从丰臣秀吉、千利休、近卫信尹、细川忠兴等为代表的武士书，到以松花堂昭乘、本阿弥光悦、秋叶贡庵、荒木素白等为代表

的禅宗书；从以石川丈山、隐元隆琦、即非如一为代表的御家流，到17世纪唐样书法的再次展开，涌现了北岛雪山、池大雅、良宽、贯名海屋、赖山阳等书法名家。

从日本书法发展史的角度来分析，每每唐风书法的回归则预示着日本书法的大变革。江户时代以来日本书法的全面繁荣为下一场的书法革命积蓄着力量，以至明治时代的平民书法家中林梧竹、成濑大域、长三洲等都为下一场书法革命在积极准备着。在这积蓄的过程当中已经能够有了革命的“星星之火”，如白隐慧鹤书法的古拙朴素、慈云书法的娑婆不修边幅、良宽书法的浪漫简约等都成为了日本明治时代后日本“现代书法”的启明灯。它们的发展影响了整个世界当代书法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拓展了中国书法创作的视野，给予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动力，这正是文化的力量。

在秦立申先生约稿之前，我虽然出版过几本小册子，但那仅仅是技法方面的。作为理论方面的文章这是第一次，我也是在一种惶恐不安中一路写下来的。在这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我查阅了大量的日本原版资料，以艺术创作的心态努力挖掘每一位艺术家的艺术本源，本着不抄袭、不引用的原则，完全凭借着自己的艺术感觉，用自己的艺术观点，用自己原生态的语言对每一位艺术家进行解读，试图引起同道者的共鸣，并探讨一些不同观点。

CONTENT 目录

	圣德太子	1		小野道风	72
6	光明皇后		82	藤原佐理	
	最澄	12		藤原行成	92
19	空海		102	藤原公任	
	嵯峨天皇	29		藤原道子	110
39	橘逸势		116	藤原定信	
	圆仁	47		荣西	122
52	圆珍		128	道元	
	宇多天皇	60		一山一宁	134
65	纪贯之		141	宗峰妙超	

	尊圆亲王	150		良宽	224
158	雪村友梅		242	贯名海屋	
	一休宗纯	164		市河米庵	251
172	本阿弥光悦		260	中林梧竹	
	后阳成天皇	184		岩谷一六	265
191	松花堂昭乘		271	日下部鸣鹤	
	隐元隆琦	200		犬养木堂	277
206	石川丈山		284	小野鹅堂	
	北岛雪山	212		狩野君山	290
218	白隐慧鹤				



我读日本书法家

圣德太子

(574—622或621)



本名厩户皇子，尊称圣德太子、丰聪耳或法大王，又称上官太子。父亲用明天皇，母亲是钦明天皇的女儿穴穗部间人公主。日本飞鸟时代最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和书法家。由于在政治、佛教、书法等方面的历史贡献，他被后世史家称为日本历史上的“巨人”。

当我们翻阅《日本书道史》，或是检索《日本书道史年表》的时候，其开篇人物都是圣德太子，他书写的《法华义疏》皆是位列其首的经典之作，这是日本书法史上流传至今可考证的最古老的墨迹作品，由此可见圣德太子在日本书道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一地位和成就首先取决于他在政治上的开明以及对佛教的极力推崇，书法则成为了其政治智慧和全面历史文化修养的集中体现。圣德太子在历史上的贡献有两大方面：首先是政治上的；其次是文化上的，包括宗教和书法。

在政治上圣德太子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加强各氏族的国家意识和对皇权的尊重，故一面继续让氏族团结或对立，一面伺机加强中央统一之体制，打破过去以贵族为尊的制度，而以个人功勋授官赐爵，开选贤能之道，打破氏族与门户世袭的习惯。604年4月，圣德太子融汇儒、法、道、佛诸家思想精华而制定了十七条宪法，文式采用《诗经》《尚书》《孝经》《论语》《中庸》《左传》《礼记》《管子》《墨子》《韩非》《韩诗外传》《史记》《昭明文选》等汉籍而成，成就了日本历史上最早之法典，是官吏行政的法则、国家组织的原理、道德训诫的宝典，也是圣德太子集思想、道德、礼仪、法律于一炉的精神体现。

据日本《元兴寺伽蓝缘起》记载，佛教最初于公元538年传入日本，并且在佛教传入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华文明，由此日本文明从混沌开始走向开明，这也成为了日本文明发端于佛教最有利的佐证。佛教传入日本首先是在贵族阶层传播开来的，同时被统治者所接受并且成为其进行政治统治的手段。遣隋使中僧人的留学归国成为了日本文明发展的催化剂。当时佛教传播的主要手段是“经文”，因此书法作为佛教传播的载体同时被统治者接受并得到了初步传播，这种佛教与书法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就不自觉地形成了，佛教传播和发展的程度也决定了日本书法发展的命运。

587年用明天皇去世，厩户皇子（即圣德太子）担当起行使国家权力的使命。执政以后，他首先开始了被后世史家称颂的“推古朝改革”，延续以往把佛教作为政治统治的手段。圣德太子以开明的政治姿态加强对佛教的推广，为佛教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他以超前的意识开创了同中国直接交流的历史先河，为日本文明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圣德太子以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开创了日本历史上文化改革和建设的先河，派遣遣隋使者直接学习吸收中国文化，奠定了其坚实的改革基础。

公元607年，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学习中国佛法，在引进中国佛法的同时，中国书法也随着佛教的传播传入日本，掀开了日本书法史的第一页。由于当时日本书法对佛教极强的依赖性，所以流传下来的书法形体仅局限于“写经体”，从作品上看，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日本书法书体单一的特征。以楷书为主流的现象影响了日本书道史近两个半世纪，直到9世纪的平安时代（中国唐代）才有所改变。

圣德太子以各种方式加强对佛教的推广，对日本佛教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他大力弘扬佛法的同时也在不自觉地推动着另一部历史——书道史的发展。由于他的努力，这一时期流传下来日本第一批书法作品，如《法隆寺金堂药师如来造像铭》《法隆寺金堂释迦造像铭》以及他本人书写的经文《法华义疏》等。

圣德太子在日本书道史上的贡献，在于他不仅是一位号召者，同时也是一位实践者，从经典作品《法华义疏》可以反映出他的用功。据《圣德太子传历》载，圣德太子三岁开始习书，每日逾千字，深得王羲之法书之精髓。正是具有了扎实的书法功底他才能创作出《法华义疏》这样的书法传世精品。

《法华义疏》书写于615年，为标准的中国六朝书风，用笔圆润、流畅、简洁，施墨敦厚，章法自然疏朗，书体兼融章草与行草笔法，同中国西晋陆机

法華義疏第一

大委^國上官王程
此是集非海彼本

夫妙法蓮華經者蓋是極厚方善合為一曰之豐田七百近
壽轉成長遠之神藥若論迦釋如來應現長久大慈恩者
時歎宜濁世經教循同歸之妙因今得莫二之大果但眾生
宿值善微神圖根鈍以五濁障於大機六弊障其慈眼卒不
可聞一乘曰果之大理所以如來隨時而宜初就廣苑并三乘之
以別流使咸各趣之迥果況以未離淺平說瓦相勸同循或
以中道而褒貶猶以三曰別果之相譽育物機於是眾生應
年累月蒙教潛行津之益解至於王城始教大業機稱會如

的《平复帖》有着极为相似的艺术精神。从当时书法传播的途径分析，《法华义疏》当是取法六朝写经，它的风韵与敦煌写经笔法一脉相承，是日本书法史上极为重要的经典作品。

由于圣德太子“一心向佛”，服务于佛教的思想使得其书法的表现趋于“端庄”，因此造就了这一时期书法形式的“单一”。而站在书法历史的高度，这种“批评性”却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即这种“端庄”的极端追求，不自觉地为此后日本书法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法华义疏》具有着传统基石的代表意义，推动了唐风书法在日本的流行，推动了以空海、最澄为代表的日本第一次书法高潮的形成，使佛教书法作为日本书法史的主流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 《书道全集》 卷10 平凡社 1959年9月15日
 《图说日本书道史》 艺术新闻社 1997年7月15日
 《古代政治史中的天皇制的规律》 吉川弘文馆 1986年
 境野哲 《圣德太子传》 丙午出版社 1917年
 日本 《世界大百科事典第二版》 平凡社
 《日本大百科全书》 小学馆
 远山美都男 《天皇与日本的起源》 讲谈社 2003年
 江守贤治 《字和书的历史》（日本习字普及协会） 2008年



我读日本书法家

光明皇后

(701—760)

小名安宿媛，父亲是朝廷重臣、掌权者藤原不比等，母亲是抚育天皇的橘三千代。729年8月被立为皇后，与圣武天皇生有孝谦天皇、基皇太子，是日本书法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书法家，也是日本书法史上第一位女性书法家。